

元代旅杭散曲作家的心态书写

許珂新*

目 录

1. 序言
2. 元代文人旅杭心态生成动因
 - 1) 时代背景的推动力
 - 2) 杭州文化的吸引力
3. 元散曲作家的杭州书写
 - 1) 乐闲叹世类散曲的杭州书写
 - 2) 咏史怀古类散曲的杭州书写
4. 结语

中文摘要

宋元之变是一次中华传统被异质文明冲击的整体性震荡，文人以儒家安身立命为传统的人生路径遭遇断裂危机，从“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跌落。本文以旅杭元散曲作家为研究主体，适当将“地域文化”视角引入文人心态的研究，揭示特定作家群体与特定地理空间的互动关系。就时代背景而言，政治失位使汉族文人陷入身份危机，儒道融合的思想调适机制，尤其是全真教的渗透使文人逐渐以出世态度面对入世困境，形成苦闷无从消解而又借助道家的超然自我安顿的复杂心理结构。就地域而言，杭州兼具吴越水乡的优越自然风物与南宋故都的深厚人文积淀，使杭州在元代文人眼中既是审美栖居的理想之地，又是触发历史感怀的遗都场域，对文人的心态形成与创作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此基础上，乐闲叹世类散曲以山水游赏表达对功名的疏离与闲适生活的向往，但这种“乐闲”并非真正的超脱，而是文人以审美转化政治苦闷的心理策略；咏史怀古类散曲则借助杭州的宫苑遗址、历史人物等媒介，将个人失意与王朝兴亡相互叠加，以历史

* 경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수료생

镜照现实，通过委婉的方式折射出元代文人真实的时代体感。

关键词：文人心态，元散曲，杭州，西湖，地域文化

1. 序言

十三世纪，蒙古入主中原，谙弓马而不谙文学，少了在思想、言论上的管制，元代文人在创作上拥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可以在杂剧和散曲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人情世态，酣畅淋漓地表达喜怒哀乐，因此便成就了以元曲为标志的‘一代之文学’”¹⁾。宋元之变是一次关涉制度、身份与精神的中华传统被异质文明冲击的整体性震荡，传统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身份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对于长期以儒家政治伦理安身立命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元代似乎再难以按照“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实现自我价值。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²⁾社会历史因素进入文学创作必须通过文人的整合与改造，文人心态作为沟通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审美的中介，对创作的风格、形式与内容有不可分割的深刻影响，因此对文人心态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是一个极具转折意味的时代，与诗词相比，散曲在语言、声律和题材上具有更大的弹性，作为吸收了民间的俚歌俗谣以及宋元时期兴起的说唱、戏曲等艺术形式的不同于诗词的独特诗歌，散曲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取材上都不拘一格，既可以承载山水闲适等传统文人情怀，也可以书写市井情趣，能庄能谐，雅俗各有其分寸。凭借着独特的体制和风格，散曲打破了自古以来诗词温柔敦厚的审美特质，成为代表元代文人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学载体，美学风格和情感结构都与时代特征有很高的契合度。元代文人心态的改变，不只是个体遭际的偶然反应，而是特定时代结构作用于文人团体之后形成的现

1)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0页。

2) 王季思、洪柏昭，《元散曲选注·前言》，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8页。

象，考察元散曲作家群的心态呈现不仅能够看到元代文人如何借助一种较为自由的新兴文体重新安置自我，也能够看到他们如何面对政治失位与价值重估。

在较早时间的文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从文学发展历程的角度探讨文学的生成，也就是偏重文学发展的时间因素，但影响文学生成、发展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地域文化深刻地作用于一个作家的性格气质的塑造、审美情趣的培养、思想特质生成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并无可避免地进入作家塑造的文学世界。”³⁾如果要全面、深入的角度考察文学及其发展，也不能忽视影响文学的空间因素，因为作家的创作不是独立生成，在创作的时候往往受到其先天禀性以及后天习得，所受文化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的塑造，作家出生以及生活的特定自然环境以及生活环境都与地域相关联，于是对文学的研究不能屏蔽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国文学史上，论述地域与文学观念产生联系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当时各诸侯国的歌谣，有《齐风》写男女婚恋、习武狩猎，有《秦风》歌颂英勇好战，《楚辞》也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⁴⁾，历代论述与文学有关的地域观念的问题代不绝书。宋代以后，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出现以地域命名的“江西诗派”，“它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歌创作和文学领域的明朗化”⁵⁾，此后以地域冠名文学流派的方法开始流行，南宋写诗的永嘉四灵，明代写散文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等。

进入近代，梁启超开始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创作，他所著《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认为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人文地理环境不同，进而影响到这一地域的文明、风俗、精神：“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也。”⁶⁾刘师培1905年也发表了《南北文学不

3) 刘勇，《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当代文坛，2024年，第2期，第11页。

4) 陈振孙，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3页。

5) 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92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同论》⁷⁾，唐圭璋1944年发表了《两宋词人占籍考》⁸⁾等。上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出现规模性、系统性的有关地域文学、地域文化的研究，如1986年金克木先生提出地域文学研究的构想，发表论文《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⁹⁾；1990年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¹⁰⁾一书出版，其中专门有一章论述“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问题；1995年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纵向考察了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总结了分布规律，此外还有很多著作论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一些如“地域文化”、“区域文化”、“文学地理学”等概念的出现给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推进方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¹¹⁾（柳永《望海潮》）吴越地区因为天然优渥的自然环境，自古就是中国最丰富、最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生之所在。南宋时杭州被指定为行在，宋元交替之后，杭州很大程度地承接了南宋的经济和文化底蕴，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吸引着大批文人志士心向往之，黄潜《杭州路儒学兴造记》载：“杭于宋为行都。士之所聚为京学…四方之士，咸附集焉…士风之盛，不减异时。”¹²⁾不光文人名士纷纷聚首，就连从未到过杭州的妇女儿童，也知晓杭州的盛名，“浙东西之山水，莫美于杭，虽童儿妇女，未尝至杭者，知其美也”¹³⁾。（戴表元《赵子昂诗文集序》）

本文中的旅杭散曲作家主要指从元军占领临安到元朝灭亡之间非杭州籍却因仕宦、游历等各种原因在杭州有过行迹并留下有关杭州书写的散曲作品的作家。由于当时散曲不像诗词文章一样被重视，当世存名作家的生平事迹也多有不可考之处，这样的情况对于想要进行某一地区的元散曲作家研究来说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考证方面的阻碍。现根据隋树森《全元散曲》¹⁴⁾、钟嗣成《录鬼

7)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9期。

8) 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中国文学（重庆），1944年，第1卷，第3期。

9)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10)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11) 柳永著，孙光贵、徐静校注，《柳永集》，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59页。

12) 李修生，《全元文》第2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13) 李修生，《全元文》第1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簿》¹⁵⁾、明初贾仲名《录鬼簿续编》¹⁶⁾、孙楷第《元曲家考略》¹⁷⁾、吴占垒《西湖散曲选》¹⁸⁾等文学史料的查证，基本上可以构建出元代旅杭散曲作家的大致风貌，除无名氏之外，在杭州有行迹可考的外地散曲作家约有28人，简单进行分类概括，赴任于杭的有卢挚、鲜于枢、马致远、赵善庆、顾德润、郑光祖、刘致；定居于杭的有曾瑞、贯云石（维吾尔人）、乔吉、周文质、汤式、徐再思、薛昂夫（回鹘人）、张可久、任昱、朱凯、钟嗣成；游历于杭的有奥敦周卿（女真人）、关汉卿、白朴、姚燧、吴仁卿、杨朝英、周德清、冯子振、睢景臣、曹德等。

散曲可以说是元代文学的灵魂，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文人群体的精神风尚、题材类型或作家风格等方面，目前看来对于地域性散曲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够深入，且多停留表面。现存杭州元散曲研究多见于总结歌咏杭州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月，如黄大同《元散曲在浙江》¹⁹⁾、高峰《元散曲中的西湖歌咏》²⁰⁾等，高晴宇《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元代杭州散曲创作研究》²¹⁾对现存与杭州有关的元散曲进行了整体的风格总结，元代杭州散曲的研究缺乏与时代背景相关的宏观探讨。从作品体现的心态类型的角度出发，本文选择旅杭元散曲作家群的两种杭州书写作为重点考察方向：一是乐闲叹世类散曲。杭州提供了一个远离官场、亲近自然的场合，旅杭作家借山水游赏表达对功名的疏离和对闲适生活的向往，但这种“乐闲”并非单纯的超脱，常常包含着无路可进之后的自我安慰；二是咏史怀古类散曲。杭州作为南宋旧都，作家面对宫苑旧迹、湖山胜景或前代繁华，容易将个人失意与王朝兴亡联系起来，使怀古不再只是题材习

14)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15) 钟嗣成，《录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6) 钟嗣成、贾仲名著，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

17)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8) 吴战垒选注，《西湖散曲选》，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

19) 黄大同，《元散曲在浙江》，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66-76页。

20) 高峰，《元散曲中的西湖歌咏》，中国曲学研究，第九辑，第181-196页。

21) 高晴宇，《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元代杭州散曲创作研究》，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惯，而成为现实处境的折射。

2. 元代文人旅杭心态生成动因

1) 时代背景的推动力

西汉之后，儒家学说在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了主体地位，在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二位一体的人格实践中，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被牢牢托举。在以国家与道德作为价值追求的观念中，文人以固守纲常伦理以及维护皇权为统一的精神文化传统，这个精神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与文人济世利民的积极性互为依托，当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稳定性被打破，会使知识分子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定位产生质疑。

元朝政权融合了浓厚的蒙、汉二元文化，坚持在意识形态上推行蒙古人为尊，色目人次之，汉人、南人为后的差别对待。虽然入元初期统治者表面上同意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全国上下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儒学教化体系，但是“辽以释废，金以儒亡”²²⁾的观点使蒙元统治者在任用官吏时更加看重统筹全局和处理具体实际的事务的能力，科举在有元一代经年不行。元朝正式开科取士是延祐二年(1315)，但到了顺帝至元元年(1335)，科举又有五年停试，整个朝代录取的进士左、右两榜加起来仅有1139人，就像有学者所说，“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²³⁾传统儒士阶层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群体，仕进多岐使绝大部分元代文人成了政治中心的边缘人，有元一代形成了庞大的在野文人群体：

呜唵！四民失其业久矣，而莫士为甚……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饱

22) 苏天爵撰、姚景安校，《元朝名臣事略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06页。

23) 金净，《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食，而肆其力于负贩技巧者，亦岂少哉！²⁴⁾黄潜《送叶审言诗后序》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游历于社会政治系统之外的智者哲人群体。他们与官僚政治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²⁵⁾蒙元统治策略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仕进为追求的文人群体的从业准则，文人从“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跌落，甚至面临生计问题也无法保证的困窘，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这无论对元代文人群体还是文人个体的心理走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精神可以把一个行动着的人的天赋能力激发到它最大的限度”²⁶⁾。作为中华文化承载体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和新变得冲击下精神面貌一度呈现出苦闷无法得到消解的状态：

“才人志士，既忧其威力，复沉抑下僚，乃入于放浪纵逸之途，而悲歌慷慨之情，遂一发之酒边花外征歌选色之中。”²⁷⁾

儒道两家构成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上“道德”与“思辨”互补的调适系统，使他们在心态和行为上能够保持平衡，每当知识分子志不得显的时候，从道家发韧的思想会增强知识分子对变故的接受与适应能力，为他们提供自我调节的空间，如林语堂所言：

“故道家哲学乃所以说明中国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²⁸⁾

宋金元交替时期，在道教鼎革浪潮中涌现出的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称全真教是以太上老君为祖，以释迦牟尼为宗，以孔夫子为科牌而立，在

24) 黄潜，《金华先生文集》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25) 阎步克，〈士大夫与官僚制〉，《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26) (俄) 别林斯基著，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

27) 刘永济，〈元人散曲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页。

28) 林语堂，《老子的智慧·序论一》，北京：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传教过程中：

“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²⁹⁾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全真教强调克己复礼的重要性，将忠孝置于修行首位，全真教教义要求修道之人时时省察自身，防范物欲之心的生长，并教导人们息嗔忍辱，安贫守贱，要求放弃现实追求与抗争：

“乃至大小喜怒、毁谤、打骂、是非、见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结旧冤，现世要还，须当欢喜承受，不敢辩证。承当忍耐，便是还讫，但有争竞，便是抵债不还，积累更深……”³⁰⁾

这正契合了当时统治阶级希望臣民甘心忍受压迫的心理，因此在蒙元时期全真教颇受蒙元统治者的青睐，全真家利用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又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救亡抚存的作用：

“或见人危疾，必书符以救之；或忧民阻饥，必设粥以济之。”³¹⁾

作为道教统绪之一，全真教既承继道家风范，又结合独特儒风，教义逐渐被知识分子认同，再加上诸多善行赢得了许多好感，吸引了大批文人与之往来，“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修炼的心法又契合了元代仕途受阻的汉族文人的心理结构，由此全真教的观念逐渐向文人渗透。马致远与全真教素来关系密切，他的【双调·夜行船】《秋思》一曲以〈夜行船〉：“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为开篇，化用庄周梦蝶的典故，乍看是道家超然的心境，然而“堪嗟”二字却又透露出真实的喟叹，作者以“道心”观人生，却并未因此消解遗憾，反而因

29) 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26页。

30) 《道藏》第23册，〈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22页。

31)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25页。

为清醒地回望更加沉重。事实上，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许多元散曲作品中都存在十分强劲的儒道思想的内在张力，使散曲的文本结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逻辑，文章的情感节奏也变得强烈浓厚。

在道家思想和全真教的影响下，文人不再强烈地追求功名富贵，而是寻求自我安适的生活，再加上元代大部分士人沦为市民阶层，求变尚新、贵生重利的底层文化心态开始渗透士人的价值体系，这些处于社会阶级中下层的士人受市井文化的影响，文学创作开始透露出“俗化”的印记。在俗的审美情趣指导下，文人创作形式上也开始由追求典雅的诗歌更加转向作为都市文化衍生物的散曲创作，内容也开始更加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人生常态，这一集体性的文体转向，可以说是他们以“离开正统文学场域”的方式在新的文学土壤重建自我，散曲的俗、直、放、谐正是当时历史处境下的文人集体心理状态的投射。所谓“俗”，并非粗鄙，而是通过吸收日常口语使文学表达更接近现实人生；所谓“直”，则表现为不再层层包裹情绪，而是允许怨、愁、悔等情感的直接出场；“谐”是以自嘲、反讽、俳谐的方式使情绪获得可承受的表达形式；“放”，则体现为对诗词温柔敦厚传统的突破，以及对功名、礼法、身份秩序的松动与反拨。姚燹有一首有名的【越调·凭阑人】《寄征衣》：

欲寄征衣君不还，不寄征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³²⁾

思妇诗本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往往借梳妆、捣衣、望月、登楼等意象委婉表现远别相思与闺中孤独。以往此类作品虽情感真切，但多遵循诗词典雅含蓄的表达传统，重在以景托情、以物起兴，情感呈现较为节制。“寄衣”在思妇诗中本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动作，历史文本中的思妇大都是因相思辗转反侧或心生怨艾，对“寄衣”这一行动本身并没有争议，传统文人可以借此隐喻为臣子对君王的依恋。但姚燹这支小令中的对于“衣”寄与不寄的本身并无定论，看不出以往思妇诗中的缱绻情深，24字不设繁复典故，也不作曲折铺陈，只围绕“寄”与

32)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12页。

“不寄”这一生活动作展开，以近乎口语的句式直接呈现思妇的心理矛盾，使传统闺怨题材由诗词的含蓄婉曲转向散曲的浅近直白。此小令，市井民众以为是寻常女子真实的相思体验，士人也能依照传统寻求知己，它广泛地满足各个层次听众的欣赏需求，这正是散曲的艺术风格精妙之处。

2) 杭州文化的吸引力

迫于生存压力，元代知识分子开始以各种手段谋生，随着职业选择的多样化，知识分子或跻身于市井，或游历于江湖，文人的流动性增强，不再固守传统。“时代与地域的关系，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³³⁾彼时的杭州，艺文创作、文化产业活动十分昌盛，经常举办规模庞大、主题多样的唱酬雅集活动，文人相约集会赋诗、题画观书，再加上杂剧从中原地区扩展到了江南，为了寻找更多的文化认同感，越来越多的北方文人南下积聚杭州，北方文人张之翰曾作诗：莫惜辞燕远入吴，圣朝南北混车书。四千里是两都会，三百年开一坦途。³⁴⁾（《送李仲芳赴临安行省掾》）其将杭州与大都并列为都城，可见当时的杭州在元代文人心中占有中重要位置。

“地理因素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创作发生作用，文化传统自然也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创作发生作用”³⁵⁾，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一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思考人生、发挥想象、审美创造的凭借。杭州的地理环境特殊，呈“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西南多山，北部多水，襟江带湖，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宋代范成大《吴郡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上天堂，地下苏杭。”³⁶⁾几乎成为后世称赞杭州

33) 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96页。

34) 邓瑞全、孟祥静点校，《张之翰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35)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6)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333页。

景色的标语。杭州自然风物众多，“其山则有南高峰、北高峰之峻险，其水则有西湖、玉泉之清冽，其寺宇则有净慈、灵隐之雄壮，其洞壑则有飞来、金鼓之幽深。古迹之多，名胜之雅，林木之秀，花鸟之蕃，当为海内第一。”³⁷⁾凭借得天独厚的风光与地理优势，杭州景色冠绝江南，受到世人称赞，“杭之为郡，冠乎东南。”³⁸⁾元代散曲中，杭州的四时节气、湖光山色、昼夜阴晴无不曾在笔下徐徐展开，“春风骄马五陵儿，暖日西湖三月时，管弦触水莺花市。”³⁹⁾（马致远【双调·湘妃怨】《和卢疏斋〈西湖〉》）“绮罗馨，管弦清，兰舟直入空明镜，碧天夜凉秋月冷。天，湖外影；湖，天上景。”⁴⁰⁾（刘时中【中吕·山坡羊】《侍牧庵先生西湖夜饮》）应了周文质那句：“乾坤内，山共水，论风流古杭为最。”⁴¹⁾（【双调·落梅风】）

“人们在使用‘地域’这一概念时，除了具有某种自然地理区域的理解之外，更主要的是意指某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的空间。‘地域’本身即是一个具有人文属性的概念。”⁴²⁾南宋时，临安作为行都之所在，更加成为集合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国家中心，日益辉煌：“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⁴³⁾至元十三年，元军占领临安，忽必烈下诏：“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制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原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⁴⁴⁾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措施施行，使江浙地区传统文化、市民经济和文艺环

37)（清）钱泳撰，孟裴校点，《履园丛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38)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中国方志丛书》，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第44页。

39) 刘益国，《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40)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659页。

41)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58页。

42) 白欲晓，《“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77页。

43) 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44) 宋濂，《元史·本纪第九》世祖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境免受大的破坏，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文人纷纷聚向杭州，戴表元《剡源集》《城东倡和小序》一篇记载杭州文人的交游盛况：交之群莫盛于杭。于是岁在大德戊戌，嘉兴顾伯玉客于杭城东，杭之贤而文者皆与之游。”⁴⁵⁾

关汉卿是元杂剧最初的代表作家，【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是他在宋亡不久后南下杭州所作，记叙了当时文人眼中的杭州形象：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⁴⁶⁾

这首作品是关汉卿作为北方文人来到杭州城作出的第一视角的观看，他可以代表大部分外地文人初入杭州后的感受。曲中所谓“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点明了彼时杭州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杭州已经进入元朝版图；另一方面，它仍然携带着南宋故都的历史余温，现实政权与前朝记忆在此叠合。关汉卿远道而来，对杭州繁华的盛赞显示出外来者的惊异目光，并且通过散曲作品把“杭州路”转化成为了外地文人观察江南、理解繁华、感受历史变迁的文学景观。元朝全盛时，马可·波罗游历杭州也发出惊叹，称它：“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⁴⁷⁾

特定的自然环境沉淀着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文化，杭州不仅风光无限，更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对浙江的评价：“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⁴⁸⁾从历史角度看，杭州可以视为良渚文化的发源地，司马迁《史记》记载：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⁴⁹⁾。晚唐以后，杭州是吴越国国都，北宋成为“东南第一州”，靖康南渡时，北方人口大规模南

45) 李修生，《全元文》第1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46)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1页。

47)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记》第2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48) 王士性，《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7页。

49)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0页。

迁，北方人的风俗习惯逐渐在江浙本土文化的脉络中沉淀下来，与杭州原本的地域文化相结合，促使杭州形成了海纳百川，多元共生的文化氛围，既保留了都市繁华的市民娱乐，又兼容了文人阶层追求的湖山隐逸志趣。南渡之后，宋高宗建立行宫朝立于此，《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历史典籍与《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等文人笔记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杭州的记载，“苏堤游人来往如蚁……湖山游人至暮不绝。”⁵⁰⁾“大抵杭城是行都之所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⁵¹⁾“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伴，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⁵²⁾

历代歌咏杭州的诗词文章不可胜数。唐宋以来，由于白居易、林逋、苏轼等名家的垂范，杭州的自然地理魅力与人文历史魅力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以及彰显，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诗作脍炙人口。以西湖为例，《梦梁录》载：“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⁵³⁾北宋时苏轼（1037-1101）两度在杭州任职，曾称自己为“杭州人”，元祐五年（1090）他为西湖写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⁵⁴⁾他还创造性地将西湖的自然之美与西施进行类比，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⁵⁵⁾为西湖之美确立了千古不变的具有压倒性认同感的美学意象。林逋（967-1028）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隐逸诗人，一生不仕不娶，以布衣身份隐居西湖边的孤山，他尤爱梅花与白鹤，后世称其“梅妻鹤子”，林逋的事迹使他成为杭州文化史上象征高洁孤傲人格的象征，后人争相吟诵，“苏堤堤上寻芳树，断桥桥畔沽醪醕，孤山山下醉林逋。洒梨花暮雨。”⁵⁶⁾（曾瑞

50) 吴自牧，《梦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51) 吴自牧，《梦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5页。

52) 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32页。

53) 吴自牧，《梦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54) 毛维编，《苏轼文集》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64页。

55) 曾枣庄编，《苏东坡诗词，名家集评本》，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79页。

56) 李春祥校注，《曾瑞散曲集校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正宮·醉太平】）此外，还有许多反映杭州民俗风情、社会活动的散曲：“尘蒙玉轸，妆残翠靥，围褪罗裙。月明谁上秦楼问，香冷灯昏。水北花南那人，莺来燕去三春。清明近，于飞上坟，不由我不伤神。”⁵⁷⁾可见，经过近千年的演变，杭州已然形成了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地域文化。

3. 旅杭元散曲作家的杭州书写

1) 乐闲叹世类散曲的杭州书写

“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⁵⁸⁾文学地理学关注文学活动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作家、文本与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理论视角对于研究元代旅杭散曲作家尤为合适。在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下，“乐闲”的生活成了最符合元代文人心意的表达，杭州以秀美的湖光山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着悠游无所适从的文人墨客，一部分文人选择杭州作为栖息之地。以曾瑞（约1260~1330）为例，字瑞卿，大兴人，终生未仕，在西湖边悠游多半人生，钟嗣成《录鬼簿》有他的略传：

瑞，字瑞卿，大兴人。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异，衣冠整肃，悠游于市井，洒然如神仙中人。⁵⁹⁾

对于外地作家而言，杭州首先是被想象、被进入、被观看的空间，凝聚着西湖山水、故都遗迹、都市繁华与文化记忆，杭州的地域文化不仅带来感官上

57)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27页。

58)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2015年第3期，第125页。

59) 钟嗣成，《录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的享受，更加触发着他们对于个人遭际、生命安顿和历史兴亡的思考。周文质（？-1334），祖籍建德，后迁居杭州，与钟嗣成是至交，《录鬼簿》称他：学问该博，资性工巧，文笔新奇。家世儒业，俯就路吏。”⁶⁰⁾他的套曲【越调·斗鹤鹑】《自悟》（节选）云：

弃职休官。张良范蠡。拜辞了紫绶金章。待看青山绿水。跳出狼虎丛中。不入麒麟画里。想爵禄高。性命危。一个个舍生忘死。争宣竞敕封。⁶¹⁾

元散曲家对乐闲生活描绘的一个十分明显以及普遍的特征就是他们会将出世时闲适安心的隐居生活的与仕途的险恶、用世时的劳心劳力作强烈的对照，马致远（约公元1250~1324）是一位有明确旅杭经历的元散曲作家，钟嗣成《录鬼簿》中记录了马致远：“大都人，号东篱，任浙江行省务官。”⁶²⁾他的【双调·拨不断】：

浙江亭，看潮声，潮来潮去原无定，惟有西山万古青。子陵一钓多高兴，闹中取静。⁶³⁾

这首作品看似描写钱塘江景色，实际也一样蕴含出世与入世作对比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对士大夫而言，传统隐逸赞扬的是伯夷叔齐般彻底断绝尘世，元代文人的“乐闲”则少了一份自我完善的要求，追求的是“无名缰利锁，携壶策杖穿林落，临风对月闲吟课，有花有酒且高歌……”⁶⁴⁾（曾瑞【正宫·端正好】《自序》）的任情任性。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长期以来内化的文人品格已经消失，事实上，元代文人的乐闲是一个曲折的自我心理剖析过程，“乐闲”指向的精神目标，

60) 钟嗣成，《录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6页。

61)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63页。

62) 钟嗣成、贾仲明著，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68页。

63) 刘益国，《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64) 李春祥校注，《曾瑞散曲集校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是通过对社会事功的蔑视，引起对个人价值的再认识。刘致，字时中，本是石州宁乡（今山西平阳）人，为翰林学士姚燧所赏识，被荐为湖南宪府吏，后出为江浙行省都事，再之后流寓杭州，卒贫无以葬。他在杭州留下了不少散曲作品，其中有一首【仙吕·醉中天】《西湖春感》：

花木相思树，禽鸟折枝图。水底双双比目鱼，岸上鸳鸯户。一步步金镶翠铺，世间好处。休没寻思，典卖了西湖。⁶⁵⁾

这首作品前六句以密集的意象铺陈西湖春日之美，末句突然折转，以“典卖了西湖”的冷隽语收束，实在耐人寻味。在《乐府群玉》中“典卖了西湖”一句下有作者自注云：“宋谚有‘典卖西湖’之语：台谏谓之‘卖了西湖’，既卖则不可复；省院谓之‘典了西湖’，典犹可赎也。无官守言责，则无往不可，此古人所以轻视轩冕者欤？”⁶⁶⁾“台”和“谏”分别指御史台与谏院，掌管弹劾和规谏；“省”和“院”即中书省与枢密院，制法令、行政务。二者皆属官守，即“轩冕”一流，这是说为人一旦入仕，便被官场的“典卖”逻辑所束缚，但若只是平民百姓，没有官守言责的拖累则“无往不可”，能够自由流连山水。作者的意图分明是在劝诫世人：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涂的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此曲以西湖之美为载体，以“典卖”为核心隐喻，是将乐闲与感叹两种心态巧妙融于一曲，西湖的美是乐闲书写的对象，而“典卖”的典故则激活了作者内心的叹息之感。全曲以轻盈活泼的笔调流出，却在末句留下了沉甸甸的余味，是元代旅杭散曲中以小令形式承载复合心态的典范之作。刘时中还有一首【中吕·山坡羊】《西湖醉歌次郭振卿韵》：

朝朝琼树，家家朱户，骄嘶过沽酒楼前路。贵何如，贱何如，六桥都是经行处。花落水流深院宇。闲，天定许；忙，人自取。

65)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650页。

66)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650页。

这首【中吕·山坡羊】并不是单纯写西湖醉游，而是借西湖重新思考贵贱、闲忙与人生取舍。“朝朝琼树，家家朱户，骄嘶过沽酒楼前路”先写出西湖周边权贵之家车马往来、酒楼繁盛的景象，表明作者感受到的江南繁华。接下来的“贵何如，贱何如，六桥都是经行处”把视角从富贵人家转向苏堤六桥，六桥本是无论贫穷富贵人人可以经过的地方，借助六桥的“公共性”仿佛可以暂时消解人们现实社会中的贵贱差异，然而细想便可明白，六桥的无差别，恰是现实有差别的反面投影。“花落水流深院宇”又把这种感受推进一层，花落水流是流动而又自然的；“深院宇”则是人为的隔绝的，自由与封闭在这里展现。作者表面写景，实际借这里的空间表达了对社会等级的反思。结尾“闲，天定许；忙，人自取。”是全曲心态的归结，所谓“闲”，是文人为自己寻找的一种精神安顿，并不是完全主动选择的潇洒；所谓“忙”，则指奔走名利、追逐富贵的贪念。刘时中把“闲”归于“天定”，把“忙”归于“自取”，以“天定”为乐闲作背书，说明乐闲并非发自内心的选择，而是为闲适寻找的合理依据，这种急于论证的姿态，恰恰暴露了作者无法真正安定的内心，这首作品表面上是作者酒后对西湖周边景致的描写，在更深层面却透露了元代文人面对现实无力改变时的自我劝慰。

“地域文化应当是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为载体，以现实为表象，在社会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⁶⁷⁾以上文人在杭州山水风月下的吟唱表明，元代文人所谓的“乐闲”，在以看破是非的姿态去乐山乐水的深层意识中时常流露出对现实失落的感伤。这是因为在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交叉共同形成的悲剧中，元代文人无法靠标榜道德操守来获得社会的尊重，以“适意”、“适己”为生命存在的基点适应了他们需要新的人格塑造的需求，于是他们逼迫自己忘怀得失，退守到心灵的一角来驻守士大夫的尊严。

2) 咏史怀古类散曲的杭州书写

“因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而触发自己的生命意识，对文学家来讲，既是一种

67) 李建平，《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人民网，2006年3月14日。

思维习惯，更是一个审美传统。”⁶⁸⁾咏史怀古散曲是元散曲的一个重要题材，这一题材的作品往往具有极强的尖锐性，以曲折的方式抒发山河易代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伫立在杭州的遗宫与亡陵承载着沉重的文化意涵与情感寄托，元散曲中咏史怀古主题的杭州书写篇章占有很大篇幅。周德清（1277-1365）是北宋词人周邦彦之后，他的一生书剑飘零，游历杭州时作【中吕·满庭芳】《看岳王传》：

披文握武，建中兴庙宇，载青史图书。功成却被权臣妒，正落奸谋。闪杀人望旌节中原土夫，误杀人弃丘陵南渡銮舆。钱塘路，愁风怨雨，长是洒西湖。⁶⁹⁾

“墓地诱导心灵进入一种特别的状态，而心灵的活动则会影响我们对于墓地的感知。”⁷⁰⁾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为秦桧所害，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以高宗之名为岳飞平反，将其遗骸葬于杭州西湖畔栖霞岭南麓，追谥忠武，之后岳王庙成为后人追思英雄功业、感怀国家命运的悼念之地。全曲前半段重述岳飞的文武才略与中兴功绩，后半段急转至“功成却被权臣妒，正落奸谋”，以“权臣”与“奸谋”两个词汇揭露秦桧陷害岳飞的历史真相，在蒙元政治体制下，汉族文人无法直言现实政治的黑暗，借咏历史事实表达对忠臣被害、奸佞当道这一历史模式的愤慨，是元散曲咏史怀古话语策略的典型体现。“闪杀人望旌节中原土夫，误杀人弃丘陵南渡銮舆”两句指责南宋王朝误杀忠臣，以中原土夫的望眼欲穿与南渡朝廷的偏安苟且相对照，将岳飞之死的历史影响扩展为整个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历史评判之中暗藏着元代文人对民族正气被奸佞压制这一历史模式的深切共鸣。

张可久（约1280-1348），一生仕途坎坷，位卑为吏，久居杭州。《泉鬼簿》有其小传：“张可久，庆元人，路吏，转升民首领官。有《今乐府》盛行于

6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0页。

69)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35页。

70) (美)段义孚，《风景断想》，长江学术，2012年，第49页。

世，近有《吴盐》《苏堤渔唱》。”⁷¹⁾曾在西湖旧址写下：

夕阳芳草废歌台，老树寒鸦静御街，神仙环佩今何在？荒基生暮霭，叹英雄白骨苍苔。花已飘零去，山曾富贵来，俯仰伤怀。⁷²⁾

“地理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如何对地理空间进行想象与建构，探讨文学虚构空间如何对真实空间进行重构、再现和超越”⁷³⁾。张可久一生沉郁下僚，有大量杭州尤其是西湖题材的散曲存世，这首【双调·水仙子】的重点不是“怀古”，而是借杭州故都遗迹把历史兴亡与个人失意叠合起来。“夕阳芳草废歌台，老树寒鸦静御街”，“歌台”、“御街”代表南宋时临安作为行在的繁盛，象征宫廷娱乐和王朝气象，但如今它们已经失去往日的恢弘和喧闹，夕阳芳草、老树寒鸦这些意象，将昔日繁华转化为荒凉冷落。所谓的“神仙环佩”，可以理解为昔日宫苑中人物的歌佩玎珰如今已归于沉寂，只剩废圯旧址。“叹英雄白骨苍苔”不只是对历史英雄的悼念，更隐含着对自身沉沦下僚、功名难成的自我投射，英雄最终也不过白骨埋于苍苔之下，则一介布衣的落寞又能向谁诉说？作者面对的不是抽象历史，而是眼前遗址中显现出来的兴亡感。末句在“山水恒在”与“人事已非”的对照中，历史感和生命感被激发出来，其“伤怀”既是对王朝兴亡的感叹，也是对个人命运无所依凭的叹息。

杭州为文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将个人失落与历史兴亡相互激发的场所，历史的荒芜与文人的内心在这里发生了共振，元代文人似乎不再歆羡古圣先贤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人生如梦成为了当时文人普遍的心理，因此他们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合理性产生了疑问，马致远在杭州写下【双调·新水令】《题西湖》：

橹摇摇，声嗟呀，每华一梦天来大，风物逐人化。虚名争甚那？孤舟驾，功名已在渔樵话，更饮三杯罢。⁷⁴⁾

71) 钟嗣成，《录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页。

72)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62页。

73) 颜红菲，《开辟文学地理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6），第112-117页。

刘秉忠曾写下一首在杭州的吊古之作【南吕·干荷叶】，立足于宏阔的时间轴减轻单人或某一事件的分量来消弭成败是非：

南高峰，北高峰，惨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场空。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⁷⁵⁾

“在文本地理空间的各个要素中，人物是核心要素，而其他要素则是因人物而设置的，例如景观（地景）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或场所，也是触发人物的情感与思想的媒介；实物…或是供人物使用，或是引发人物想象、联想与思考；事件则是围绕人物的性格或命运而展开的事件。”⁷⁶⁾南高峰、北高峰是西湖胜景之一，习称“双峰插云”，是杭州的重要地理坐标。作品一开始以两峰入笔，把历史感受安放在具体的空间之中，作者不是抽象议论南宋兴亡，而是使山峰成为了见证王朝更替的背景，“烟霞四洞”本为西湖胜迹，相传宋高宗曾在其中之一的石屋洞避难，并册封其为“南山第一洞天”，惨淡两个字说明这个地方在南宋覆亡的历史语境中变得黯淡。宋高宗的南渡，使杭州成为南宋政治中心，但在元人回望中，这一切最终都归于“一场空”。这里的“空”不仅是否定南宋王朝的历史结局，也包含对帝王功业的整体消解。“吴山依旧酒旗风”则以吴山仍在，市井生活依旧热闹形成反讽，时间并不因王朝兴亡而停顿，自然山水和城市风物的延续，反衬出政治权力与王朝功业的短暂。“梦”字说明曾经的繁华、帝王的经营都不过是幻象，“两度”可理解为历史中江南偏安局面的重复。这首曲作的核心在于借杭州山水之恒久，写人事兴亡之虚空。南高峰、北高峰、烟霞洞、吴山、酒旗风共同构成杭州的文学地理图景，而宋高宗与“一场空”、“江南梦”则把这一图景转化为历史反思。

这些出自不同创作背景的作家在杭州留下的相近表达，是元代文人在共同

74) 刘益国，《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75)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页。

76)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和性质》，临沂大学学报，第38卷第2期，2016年4月，第66页。

的政治压抑下形成的集体心理状态的折射，从文学策略上看，是通过推翻儒家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英雄叙事实现对现实的委婉批判，且这种方式比起直接否定蒙元政权规避了带来灾祸的政治风险，体现了特定情景下知识分子独特的话语智慧。作家以史为鉴，用当代的视角观照杭州历史，将自身的感受附会在杭州历史中的人物、事件以及遗迹之上，深刻的感悟实际蕴藏的是当时元代文人所处当下的真实体感，他们以历史与英雄为话题引入，正反映出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在那些即兴走笔的文章中，能够感受到作家们在审视历史时的沉痛旁白。

4. 结语

元代文人的心态与仕进受阻、民族制度等社会政治因素有关，也与儒道融合、全真教兴盛以及士人自我调适方式的变化密切相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散曲因其语言自由、题材宽广、情感表达直接，成为元代文人书写的重要文体。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文学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交叉学科，心态史学关注历史中集体精神状态的演变，强调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对个体心理的塑造，而地域文化将文学创作视为特定地域条件的文本表达，将两者结合引入元散曲研究，有助于从“人—地—文”的三角关系中重新理解元散曲的文化内涵。

在时代背景的推动和杭州文化的吸引下，杭州成为文人聚集地，元代旅杭散曲作家的书写实践，是地域文化与文人心态相互生成的典型案例。“地域文学研究或者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要从地域的角度来讨论文学，研究地域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研究在地域及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文学的发展规律，从而丰富、深化文学和文学史研究。”⁷⁷⁾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杭州在元代文人的心态生成中发挥的不只是背景性的作用，而是主动的参与。白居易、苏

77) 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中国文学与文化，2004年3月20日，第127页。

轼、林逋等人在杭州留下的人文传统，为旅杭文人提供了可以接续的精神谱系，西湖、吴山、钱塘江、孤山等地理坐标，成为承载特定心态的文化符号，杭州开放包容的市井文化生态，则为散曲这一雅俗兼济的新兴文体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土壤。正是在这一地域文化的浸染与塑造下，旅杭散曲在题材选择、意象系统与情感逻辑上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特征。

本文以旅杭散曲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乐闲叹世与咏史怀古两类杭州书写的散曲文本解读揭示了元代杭州的人文地理与文人心态的深层互动。杭州这一特定地域将历史的余温与山水的审美叠合于一处，这种双重地理性格为旅杭文人提供了两种不同却互相补充的精神资源，自然山水赋予了他们乐闲书写的审美依托，历史遗迹则激活了他们咏史怀古的情感共鸣。这两类书写并非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元代文人外在潇洒而内里沉郁的心态结构：乐闲叹世类散曲表面上以山水游赏、闲适自足为主调，实则是元代文人在仕途断绝之后以“自我说服”代替“主动选择”的心理策略。刘时中“闲，天定许”的天道背书、曾瑞的“有花有酒且高歌”的任情任性、马致远“醉和醒，争甚”的道家消解，无不在乐闲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无处安放的失落。咏史怀古类散曲则以历史兴亡为镜，将个人命运的困顿投射于王朝更替的宏观叙事之中，周德清借岳王庙感慨忠义受屈，张可久对废歌台俯仰伤怀，刘秉忠以“宋高宗，一场空”道尽盛衰虚无。乐闲也好，怀古也罢，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心态的两种面向：乐闲叹世是在当下的山水中谋求精神安顿，咏史怀古是在历史的废墟上完成情感消解，二者共同指向元代文人在价值失序之后对自我尊严的重建努力。杭州的地理文化特质使这一重建过程获得了具体的空间依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旅杭元散曲的杭州书写不只是风景的描摹或历史的感叹，而是一代文人在特定时代处境中精神轨迹的地域化呈现。

综上，元代旅杭散曲作家的心态，是特定时代背景与特定地域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元代文人以散曲这一灵活自由的文体，在杭州的山水人文之间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坐标，在乐闲与叹世之间、在怀古与自伤之间，留下了元代文人精神困境最真实的文学记录。

参考文献

著作

- (俄) 别林斯基著, 别列金娜选辑, 《别林斯基论文学》, 梁真译, 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8年。
- 白如祥辑校, 《王重阳集》, 济南齐鲁书社, 2005年。
- 陈垣, 《道家金石略》,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
- 陈振孙,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 《道藏》第23册,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
- 范成大, 《吴郡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8年。
- 冯承钧译, 《马克·波罗记》,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
- 黄潜, 《金华先生文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 金诤,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 上海中华书局, 1936年。
- 柳永著, 孙光贵、徐静校注, 《柳永集》, 长沙岳麓书社, 2003年。
- 刘益国, 《马致远全集校注》,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
- 刘永济, 《元人散曲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 林语堂, 《老子的智慧》, 北京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年。
- 李春祥校注, 《曾瑞散曲集校注》,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
- 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年。
- 毛维编, 《苏轼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 孟元老等,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
- (清) 钱泳撰, 孟裴校点, 《履园丛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 司马迁,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 宋濂等撰, 《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 苏天爵撰, 姚景安校, 《元朝名臣事略》, 北京中华书局, 1996年。

-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国方志丛书》明嘉靖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 王季思、洪柏昭,《元散曲选注·前言》,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
- 王士性,《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吴战垒选注,《西湖散曲选》,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
- 吴自牧,《梦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 阎步克,《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曾枣庄编,《苏东坡诗词,名家集评本》,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
- 钟嗣成,《录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钟嗣成、贾仲明著,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
- 周德清辑,《中原音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论文

- 白欲晓,《“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 (美)段义孚,《风景断想》,《长江学术》,2012年。
- 高峰,《元散曲中的西湖歌咏》,《中国曲学研究》,第九辑。
- 黄大同,《元散曲在浙江》,《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 李建平,《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人民网》,2006年3月14日。
- 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9期。
- 刘勇,《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当代文坛》,2024年第2期。
-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2015年第3期。
- 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中国文学》(重庆),1944年第1卷。

- 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中国文学与文化》,2004年3月20日。
- 颜红菲,《开辟文学地理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
-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和性质》,《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第38卷第2期。
-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 高晴宇,《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元代杭州散曲创作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ntality of Yuan Dynasty Literat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 A Case Study of Itinerant Sanqu Writers in Hangzhou

Xu Kexin

The Song-Yuan transformation represented a holistic shock to Chinese tradi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a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 Literati fell from their social status as the "head of the four classes," and the prolonged suspens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isrupted their traditional life paths grounded in Confucian ideal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focus of literati literary creation shifted from conventional poetry (shi and ci) towards *sanqu*, a more flexible and freer emerging genre.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its focus on itinerant *sanqu* writers in Hangzhou, introducing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collective study of literati psychology to reveal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i mentality and specific geographical spaces.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displacement plunged Han literati into an identity crisis.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Confucian-Taoist fusion—particularly the infiltration of Quanzhen Taoism—enabled them to confront secular dilemmas with a detached attitude, forming a complex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unresolvable angst balanced by Taoist self-accommodation. Regarding Hangzhou's regional culture, the city integrated the superior natural elements of the Wu-Yue water towns with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outhern Song capital. Consequently, Hangzhou served not only as an ideal aesthetic dwelling for Yuan literati but also as a dynastic ruin that triggered historical contemplation, profoundly shaping their mentality and creative orientations.

On this basis, *sanqu* works of the "enjoying leisure and lamenting the world" category expressed a detachment from official honors and a yearning for pastoral

life through landscape appreciation. Yet, this "leisure" was not genuine transcendence but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to aesthetically sublimate political frustration. Meanwhile, sanqu work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mplation and nostalgia" category utilized Hangzhou's palace ruin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as media to superimpose personal failure onto dynastic decline. By mirroring reality through history, these works obliquely reflected the authentic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 Yuan literati.

Key words : Regional Culture, Literati Mentality, YuanSanqu, Hangzhou, West Lake

투 고 일 : 2026. 7. 10. / 심 사 일 : 2026. 7. 15. ~ 2026.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8. 20.

